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陈学明 吴晓明 /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 丛书副主编

奥菲的福利国家 危机理论研究

谢 静 / 著



The Research on Claus Offe's Theory of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陈学明 吴晓明 /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 丛书副主编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 理论研究

谢 静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 / 谢静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4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229-11868-6

I. ①奥… II. ①谢… III. ①福利国家—危机论—德国 IV. ①D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1244号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

AOFEI DE FULI GUOJIA WEIJI LILUN YANJIU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谢 静 著

陈学明 吴晓明 丛书主编

张双利 汪行福 丛书副主编

责任编辑: 林 郁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天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10千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868-6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序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过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近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85 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 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 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 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 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 年,全国又建立了 21 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 2004 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述? 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 当然,为了把前

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出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续总序

这套题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丛书,早在10年前就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前后共出版了近20部书,由俞吾金教授任主编,陈学明、吴晓明任副主编。当今天再次筹划继续出版这套丛书时,俞吾金教授已谢世一年多,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俞吾金教授在“总序”中已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特点,以及对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都已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这里,我们仅做若干补充。

与10年前相比,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刻认识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明确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二级学科。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二级学科,而主要是通过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体现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传进我们中国的。中国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整个译介和研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从21世纪初到现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实践中,先前的思想障碍逐渐被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要求出现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意义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助成并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20世纪末到现在,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某种对照性的理论资源,既为论证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理论说明,也为破解中国道路面临的难题提供借鉴性的理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因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显学。我们这套丛书的价值与意义是同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清醒地知道,一套丛书的命运固然主要是取决于社会对其需求的程度,但同时也离不开这套丛书自身的品质。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使这套丛书的品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我们打算做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进:

其一,原先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主要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或者某种思潮、某种流派,现在我们力图强化“问题意识”,在继续推出研究人物、思潮、流派的著作的同时,着重出版以问题为导向的著作。

其二,原先我们的视野主要局限于西方的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现在我们试图进一步扩展视野,把更多的思想家包含进来。具体地说,本丛书所涉及的国外思想家将包括“三个圆圈”:“核心的圆圈”还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再扩展到那些并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国外左翼学者;最后再往外扩展到那些

2 “左翼”以外的学者,只要他的研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就将成为我们

的研究对象。

其三,原先本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我们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师以及在这里就读的博士生,现在我们将本丛书扩展成整个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丛书,热忱地欢迎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相关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列入本丛书出版。

其四,原先本丛书的著作基本上是以“述介”为主,即主要是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把其讲清楚。现在我们提倡在走进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从研究对象中走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做出深刻的研究,本丛书还会继续出版“述介”型的著作,但将更加重视“研究”型的著作。

最后,我们在此对重庆出版集团致以谢意。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指出,重庆出版集团是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早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他们就支持徐崇温教授推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该丛书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当时作为青年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该丛书的写作和出版。我们所编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名著提要》(三卷本),作为该丛书的一个部分,在上海推出时,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亲自参加出版座谈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重庆出版集团所做的工作。近30年时间过去了,重庆出版集团不改初衷,继续竭尽全力支持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与我们商谈出版这套丛书时,根本不与我国涉及当前出版图书通常所见的那种所谓“出版贴补”之类,这着实使我们感动。这使我们在重新策划这套丛书时,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希望以交出更多的优秀著作来回报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陈学明 吴晓明

如何理解批判理论的 “政治伦理转向”？

(代序)

法兰克福学派因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而得名,以批判理论闻名于世,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而是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然而,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例如在格律贝格时期,既没有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批判理论,但他奉行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法兰克福学派真正创始人、批判理论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三条不同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即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是笔者长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而做出的基本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霍耐特的认同)。要想理解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

转向”,首先要弄清楚“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批判;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①、A.施密特、F.V.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概言之,“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意味着:从古典理性主义到感性浪漫主义再到理性现实主义;从激进乐观主义到激进悲观主义再到保守乐观主义;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马克思主义;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道德哲学(政治伦理学);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从社会哲学到批判理论

关于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Sozialphilosophie),大致有三条不同的理解路向:^②

第一,本体论路向(典型形式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旨在从最抽象层面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该哲学的核心,由此而派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其社会哲学。当代西方许多哲

^①关于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学界有不同分期法,这是由于研究角度不同而导致的。笔者将之分为前期和后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称为前期哈贝马斯,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和现代性批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称为后期哈贝马斯,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参见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②苏国勋:《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学流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在将哲学当作关于实在的认识形式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它们对社会哲学的理解,基本上也属于本体论路向。

第二,认识论路向(典型代表是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认为,社会哲学探讨各种不同的关于理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本质的观点;有时也提出一些关于美好生活或理想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设想;通常也关心关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及其特征的评价,以此作为赞扬(有时仅仅是修辞学上的)某种社会措施或社会计划有价值的理由。这一路向理解的社会哲学类似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第三,社会理论路向(典型代表是社会科学家而非专业哲学家)认为,应该用社会理论取代社会哲学概念,并强调,社会理论不能归属于任何一门特殊学科;相反,它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而,社会哲学问题亦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它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哲学反思。

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它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①就是说,社会哲学意味着要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对人类命运进行关注。霍克海默关于社会哲学的这种广义理解,尽管并不为社会研究所成员完全认同,但即使在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贯穿了其基本精神。

那么,什么是批判理论呢?这需从“批判”一词谈起。根据《杜登德语通用辞典》(*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örterbuch*)的说法,“批判”一词源于古希腊的 *Κριτική*,是指“评判的艺术”(*Kunst der Beurteilung*),主要被用于政治实践和法律诉讼中,后来被扩展到生活习俗、社会制度、文学艺术、文献编纂等领域。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批

^①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3, Hrs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M.: Fischer, 1988, S. 20.



判(critique/Kritik)的四种模式:^①

第一,文化批判模式(评判的艺术/批评的艺术)。在这里,批判既可以做肯定性理解——评判(包括表扬在内),例如文学评论、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就包括表扬在内;也可以做否定性理解——批评,主要是对某些事物、理论、立场、观点的不认可、否定。从词源学上说,批判与危机(crisis/Krise)紧密相关。因而,任何批判都是为了拯救。

第二,内在批判模式(纯粹理性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我们知道,康德开创了理性批判传统,甚至将批判视为理性的代名词。所谓纯粹理性批判,从肯定意义上理解,是指人们如何有效地认识对象并为这种认识提供某种先验基础;从否定意义上理解,它表明某些理性要求是虚妄的。因而,纯粹理性批判就是纯粹理性的自我认识。黑格尔坚持内在批判模式,将批判等同于否定,但他并未将批判贯彻到底,从而导致了非批判的结果。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断定,黑格尔的肯定辩证法最终服务于形而上学的目的。

第三,社会现实批判模式(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批判源于黑格尔,即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批判,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某种程度的坚持,以至于在阿多尔诺视阈里,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并没有根本不同,都是将否定之否定视为肯定的肯定辩证法。不过,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构造了一种社会现实批判模式。这毕竟不同于黑格尔,仅仅局限在未能贯彻到底的形而上学内在批判模式。

第四,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模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例如阿多尔诺,将对传统哲学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对社会现实的合理化原则的批判结合起来,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批判结合起来,既坚持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又赋予批判以强烈的现实意义,构造了一种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的

^①关于批判的四种模式,是笔者近来思考的结果。不过,关于批判的理解,则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启发,如德国《批判理论杂志》编辑出版人 G. 施威蓬豪伊塞尔(Gerhard Schweppenhäuser)关于批判与危机关系的考察,以及谢永康副教授关于批判与拯救关系的分析。

模式。

当然,上述关于批判模式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批判的复杂性,以及批判究竟是什么,并不表明这种划分囊括了一切批判,没有任何例外,也不表明这种划分已经无懈可击,完全能够自治。实际上,为了揭示什么是批判理论,除考察批判的复杂性外,还要考察什么是理论?这需要从理论(theory/Theorie)与实践(practice/Praxis)关系谈起。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归结为以下四种理解:

第一,理论与实践“异中有同”。在古希腊,“实践”一词,从广义上说,一般是指有生命物的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实践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三类,即理论(θεωρία)、生产(παράγονν)、实践(πρακτική)。在他看来,生产的目的在于它产生的结果,本身并不构成目的;与生产不同,实践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在自身之内,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在理论沉思中,人独自面对真理;与理论不同,实践活动总是在人际之间展开。不过,在本身就是目的这一点上,理论与实践又是相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理论视为最高的实践。简言之,在古希腊,理论是对永恒东西的观察和凝视,而实践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在于:一是它本身就是目的;二是它不是人维持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伦理行为。^①当然,这也包括以可变东西为对象的行为。

第二,理论主义取向(用理论“吞噬”实践)。在《后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文集》(1988,德文版)中,哈贝马斯说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大的理论概念。阿多尔诺认为,尽管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但其理论理性是指纯粹理性,而其实践理性则将去实践化与去对象化结合在一起。“理性的存在者”不是根据质料,而是根据形式包含着意志的决定根据,这就是康德的实践形式主义。这种理论主义倾向,与主体主义取向联系在一起。

^①关于古希腊实践概念的详细分析,参见张汝伦:《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



第三,实践主义取向(使理论“屈从于”实践)。在这里,或片面强调实践第一性,或制造实践神话。就前者而言,尽管柯尔施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但在具体论述中有突出实践的嫌疑;至于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则更加明显,尽管他对实践有独特的理解;阿尔都塞强调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即理论实践,表面似乎是抬高理论,但实际上暗含着使理论“屈从于”实践的倾向。就后者而言,美国实用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的片面强调,几乎达到了神话的程度。阿多尔诺的这种说法,对于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启发意义,但却未必完全正确,需要具体分析。

第四,理论与实践“有差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独立又不绝对分离,而是有差异的统一)。例如,阿多尔诺既反对实践第一性,强调理论批判的重要性;又将理论批判视为一种实践形式,目前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形式——作为一种批判行为,它只能以理论的方式介入实践,否则就像大学生运动那样,变成一种“行动主义”(Aktionismus)、“实践主义”(Praktizismus)、“伪—行动”(Pseudo-Aktivität)。^①

考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揭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kritische Theorie)的内涵。所谓批判理论,从广义讲,是指人们对(包括理性在内的)文明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形成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既包括古希腊传统的评判的艺术/批评的艺术在内的文化批判模式,又包括康德传统的纯粹理性批判/形而上学批判的内在批判模式,更包括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现实批判模式;从狭义讲,特指法兰克福学派“以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即形而上学批判与社会现实批判相结合模式。这里的批判理论,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概括地说,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

^①详见[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谢永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分析。

C. 格律贝格^①领导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致力于社会主义史与工人运动史研究,对批判理论构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当然,他为社会研究所规定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并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真正奠基人霍克海默,以及所有批判理论家所继承。然而,早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②就职演说中,霍克海默就力图改变 C. 格律贝格“重史轻论”的学术路向,并将社会哲学确立为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他认为,社会哲学既不是一种阐释具体社会生活意义的价值哲学,又不是各种实证社会科学成果的综合,而是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文化的意义、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的思想。“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并非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③在《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1932)“前言”中,霍克海默又强调,社会哲学研究要与具体科学研究、一般哲学研究、纯粹经验描述、当代形而上学主流精神、世界观和政治考虑区分开来,但要与社会学研究叠合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整个社会、个人心理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整个人类文明。

事实上,霍克海默不仅为社会研究所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而且还与马尔库塞一起确定了批判理论基本纲领。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1937)、《哲学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1937)中,他们认为,批判理论并非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意义上使用的。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理论,而是青年马

①[奥]C. 格律贝格(1861—1940),又译格律恩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维也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24—1929)。

②[德]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王凤才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③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3, Hrsg. von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M.: Fischer, 1988, S. 20.



克思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因而又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例如,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对立:一是从理论基础看,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谈》(即《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追求真理的方法》,1637)奠立的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它只研究命题之间,以及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把理论视为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而批判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它关注包括人在内的社会整体,并对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二是从理论性质看,传统理论是超然物外的知识论,是缺乏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顺从主义;而批判理论则是批判社会的激进思想,是具有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批判主义。三是从理论目标看,传统理论仅仅是在认同、顺从、肯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知识的增长;而批判理论则在批判、反叛、否定社会现实中追求社会的公正合理,以求得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①

第二,系统阐发了否定辩证法,试图为早期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早期批判理论到底有没有规范基础?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意味着什么?这历来是有争议的,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明确:尽管早期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②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赞同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从这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将否定辩证法视为早期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否定辩证法是什么。

众所周知,传统辩证法(无论柏拉图、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矛盾双方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认为否定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辩证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矛盾就意味着非同一,否定辩证法是一以贯之的非同一性意识。因而,否定辩证法摈斥否

^①Vgl.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Frankfurt/M.: Suhrkamp, 2005, S. 205 – 259.

^②从与批判理论关系角度看,笔者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视为早期社会研究所核心成员,而将 W. 本雅明、弗洛姆、诺伊曼、基希海默等人视为早期社会研究所外国人员。